

Feng Li Sen's
News Anthology



冯列山

冯列山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留学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被称为“中国第一位新闻学博士”。留学期间，冯先生以《申报》驻欧洲特派记者的身份在欧洲各国采访，是中国早期驻外记者的杰出代表之一。

为纪念暨南大学新闻学系创办70周年并纪念冯列山先生对新闻学的贡献，编者整理编辑冯先生在不同时期的新闻通讯、新闻报道、新闻学论文、新闻学著作以及回忆纪念性文章，将它们汇编成书《冯列山新闻文集》。

新聞文集

邓绍根 / 编

Feng Li Sen's
News Anthology



世界知识出版社

本书由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资助出版

冯列山新闻文集

邓绍根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冯列山新闻文集 / 邓邵根编.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5012-4713-4

I. ①冯…II. ①邓…III. ①新闻学—文集 IV. ①G2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5819 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封面设计

刘豫徽
赵 玥
马莉娜
感觉空间·李辉

书 名

冯列山新闻文集

Fenglieshan Xinwen Wenji

编 者

邓绍根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 51 号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网 址

www.wap1934.com

电 话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投稿信箱

lyhbbs@hotmail.com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20×1020 毫米 1/16 33½ 印张

字 数

505 千字

版次印次

2014 年 12 月第一版 201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713-4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辑说明

暨南大学新闻教育开始于1928年。是年9月，暨南大学聘请《申报》编辑马崇淦先生出任新闻学讲师，负责讲授报学概论课程，开展了为期一年的新闻教育。令人遗憾的是，1929年7月，暨南大学停止了刚刚起步的新闻教育探索活动，但为后来新闻教育的开展埋下了火种。1946年，暨南大学新闻学系在上海成立，正式开展系统新闻教育。1949年，因暨大停办而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中文系在1960年开办新闻学专业。1970年，暨大因文化大革命被迫停办，新闻学专业也随中文系并入华南师范大学。1978年，复校后的暨南大学重建新闻学系。从此，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走上不断发展的道路。1986年，成为我国第三批新闻学硕士学位授予点之一，2001年，获准建立传播学硕士学位授予点，并升格为新闻与传播学院。2003年，暨南大学新闻学专业成为广东省高校名牌专业，新闻学学科成为国务院侨务办公室重点学科。2005年，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获批新闻学博士点，2011年，获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形成建成本—硕—博—博士后的人才培养体系。暨南大学新闻教育水平位于全国前列，在华南地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追思历史，缅怀先贤，在暨南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发展历程中，我们最先要纪念的是暨南大学新闻学系的创立者、第一任系主任冯列山先生。为纪念暨南大学新闻学系创办70周年以及纪念冯列山先生对新闻学贡献，编者整理编辑冯列山先生在不同时期的新闻通讯、新闻报道、新闻学论文、新闻学著作以及回忆纪念性文章，将它们汇编成书《冯列山新闻文集》。

冯列山（Feng Li Sen，1907—1998），福建福安人，近代中国著名

华侨报人、新闻教育工作者和新闻学者。他出生于新加坡冯氏富商之家，幼时在家乡福安读书。1924年，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后，他出任《申报》编辑。1929年，复旦大学新闻学系师生新闻学会，他被聘为该会顾问和该系兼职教授。1932年，赴德国慕尼黑大学留学，并以《申报》驻欧特派记者的身份在欧洲各地采访，1935年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获得新闻学博士学位第一人。同时，受中国报学史专家戈公振的鼓励，他先后为《东方杂志》撰写四篇探究西方各国新闻业发展状况的论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冯列山取道伦敦回到上海，重返《申报》，偶尔撰写社论。1938年3月1日，他随《申报》迁往香港，担任该报主笔。同年8月1日，胡文虎在香港出版星系第六份报纸《星岛日报》，冯列山被邀参加筹备工作并出任该报主笔，主持笔政。同时负责主编《星岛周报》。1939年，星系报业收购新加坡《总汇新报》，他被胡文虎派往新加坡担任该报总编辑。在他主持下，原本业绩不好的《总汇新报》很快获得较大发展。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冯列山从新加坡取道滇缅公路回到重庆，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1943年，他迁居成都，出任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教授，并受四川大学聘请讲授新闻学。

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内迁的各大高校纷纷复员，迁避福建建阳的暨南大学在上海复校，冯列山被聘主持创办暨南大学新闻学系。1946年，暨南大学在文法学院学生组织的“新闻研究会”的基础上设立新闻系，冯列山成为该系第一任系主任。1947年，当暨南大学新闻学系步入正轨后，冯列山辞职重返报界，开办海太平新闻公司。1949年，他南下新加坡，担任《南洋商报》社论委员，后来还负责主编大型学术性综合杂志《南洋月报》。1951年，他将自己在燕京大学新闻学系授课讲稿整理出版《新闻讲话》，由新加坡南洋报社有限公司出版。1952年，他和刘益之等南洋报人开办新闻班，负责讲授“新闻学概论与新闻写作”。除了讲课之外，他还帮学员修改新闻写法。他的《新闻讲话》在学员中“很受欢迎”。该班六十余人，后来大多成为星马华文报界的骨干力量，如陈名宗、宋兆良、梁明广和已故的潘书和、韩吉元与刘天凤等。1963年至1964年，《南洋商报》主办新闻工作者训练班，冯列山兼任训练班讲师。1971年5月2日，新加坡政府援引内部安全法令逮捕当时任《南洋商报》总经理的李茂成，总编辑仝道章、主笔

李星可和公共关系经理郭隆生。冯列山临危受命出任代总编辑兼编辑委员会主席及主笔。1972年5月1日，冯列山退休，至此前后新闻界工作近六十年。1998年8月12日下午，冯列山在新加坡逝世，享年91岁。著有《新闻学讲话》，编辑出版有《被奴役的灵魂》，译有德文小说《小侦探爱孙儿》和《小丑奥斯伦比哥》等书籍，与南洋商报总编辑连士升、中华美术研究会黄葆芳，合称新加坡文化界“福安三杰”。

为了编辑《冯列山新闻文集》，编者从2012年底开始搜集和整理冯列山先生的著作和文章。在钩沉探幽中，经历过大海捞针，一无所获的失望，品尝过“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艰辛，不过，更多的是苦尽甘来的收获。编者在图书馆查阅大量《申报》，将冯列山先生发表在该报大量新闻通讯查找并录入下来；同时在各大民国杂志中查阅并抄录下他撰写的大量新闻学论文或新闻作品。编者也利用在香港、台湾访学机会，查找和搜集冯列山资料。

目前编辑的《冯列山新闻文集》主要内容分为四大篇章：第一部分是“旅欧通讯篇”，主要是冯列山先生作为《申报》驻欧洲特派记者寄回《申报》发表的44篇旅欧通讯和13篇发表在《东方杂志》《申报周刊》《申报月刊》《时事类编》《勤奋体育月报》等文章。第二部分是“归国通讯篇”，主要是他归国后发表在《申报》撰写的43篇新闻通讯，包括《列山随笔》《旅行通讯》以及在《抗战》半月刊上发表的《欧洲危机与英德的冲突》。第三部分是“新闻学论文篇”，主要是他发表在《东方杂志》《流声机》《南洋总汇报》《时代生活》《民主论坛》《报学杂志》《大公报》《新闻学研究》等报刊上的10篇新闻学研究论文。第四部分是“新闻著作篇”，主要是1951年他在新加坡南洋报社有限公司出版南洋商报丛书第十七种《新闻讲话》。最后是附录，收录了《总汇新报与冯列山》《老报人冯列山抹不去的阴影》《老报人冯列山逝世》和《冯列山新闻作品一览表》等关于回忆纪念冯列山先生的文章和他逝世时的讣告。

当然，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时间和精力不逮，搜集资料难免有所疏漏。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现将这一阶段性成果奉献给读者，希

望能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注：因当年报纸有些地方已破损，文字有遗漏，编者不能揣测作者当时意图，为尊重作者起见，遗漏字以□替代，标点及语言习惯也尊重作者当时的特点，特此说明。

编 者

2014年3月于暨南园

我所知道的冯列山先生

卓南生*

也许是自幼即对报人、报学甚感兴趣的缘故，1961年底高中毕业前夕，当班主任、也是我们高中三年来的华文老师丘絮絮先生（1909—1967，新马地区著名小说家、诗人）要我们每位同学填写毕业后的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写着“升学——新闻学”。

丘老师看后微笑地表示：此地的大学没有新闻系，看来你非到外国留学不可了。

当时新加坡的两所大学——南洋大学和马来亚大学都未设新闻系，其实我事前已经查询清楚。因此，在投考南大——东南亚华校生梦寐以求、并引以为豪的华文民办大学时，我选择了自认为是与新闻学最接近的政治经济学系（二年级时，政经系分家，经济系移入商学院，我选择的政治系则继续留在文学院。）

正因为我对新闻学情有独钟，我很早就知道《南洋商报》有一位老主笔冯列山先生（1907—1998）是新（新加坡）马（马来亚或马来西亚）唯一的新闻学博士，但当时并不知道他同时是中国的第一位新闻学博士，更不知道他与暨大新闻系有着那么深的渊源。

对于我们那个年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马华校生来说，华文报（特别是发行量最大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两家大报）的存在与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它是我们最主要的精神粮食。

* 卓南生，新加坡旅华学者，曾任新加坡《星洲日报》社论委员兼执行编辑、《联合早报》社论委员兼东京特派员。现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当时的东南亚，东西冷战对峙的局面十分严峻，中国的 53 家出版社（其中包括两家香港的出版社）的书籍全被英殖民当局禁止进口。为此，我们这些受华文教育的青少年除了仰赖港台的部分出版物之外，我们的许多知识、信息与文学、文化的滋养，都得从本地的各华文报中摄取和获得补充。也正因为如此，各华文报从国际新闻、本地新闻、南洋新闻、体育新闻、娱乐新闻到形形色色的副刊都有其固定的广大读者群。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各华文报竞相以“（东南亚）华人社会的喉舌”为标榜和号召，是有其一定的道理和时代的烙印的。

正因为华文报在华人社会当中扮演着如此重大的角色，当时受华文教育的知识青年无不对两大报纸的主笔和名家十分关注和景仰。撰写《海滨寄简》（1—8）的南洋商报主笔连士升（1907—1973）、对晚辈写作者热心提携的《南洋商报》文艺副刊编辑杏影（1912—1967，原名杨守默）和《星洲日报》副刊编辑的方修（1922—2010，原名吴之光，也是马华文学史权威），毫无疑问，都是当时新马文艺青年崇拜的偶像。

至于关心时事的青年，无不是《星洲日报》主笔李星可（1914—1996）、郭史翼及其国际问题特约专栏作者全道章（笔名同一，1920—1995）等的忠实读者。此外，《星洲日报》通讯版常刊载的流莺（另一笔名为柳门）时评（寄自巴黎）、发自伦敦的达人通讯以及《南洋商报》“综合版”寄自美国的梁厚甫（1908—1999）之国际观察，也都备受各方关注。

相对而言，冯列山先生为《南洋商报》所写的社评和“星期日论文”，也许是因为写得比较含蓄和平稳，似乎并未引起当年热血沸腾、投身反对英殖民统治、争取独立运动的青年读者的特别关注。

不过，据不少曾经在《南洋商报》上过冯列山新闻培训班的记者后来的追述，此刻的冯先生除了撰写社论之外，他在报馆另一重要任务是主持新闻工作者训练班。这些课程的内容从新闻学的理论、伦理到实践，对于当年有志献身于新闻事业的青年来说，无疑是及时雨。不少前学员对此津津乐道，他们后来都成为《南洋商报》乃至华文报合并后的《南洋·星洲联合早报》（简称《联合早报》）的中坚份子。

我认识冯先生是在我留学日本之后，尽管之前在新加坡，早已熟

读其大作《新闻讲话》（南洋商报丛书第十七种，1951年）。在那个中文书荒的年代里，我虽然经常和同学们逛书店街，但在我书柜里的新闻学书籍，除了冯先生的《新闻讲话》和谢六逸的《实用新闻学》之外，就只有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香港太平书店，1964年）和冯爱群的《华侨报业史》（台北学生书店，1967年）。因此，《新闻讲话》可以说是我接触新闻学最早的启蒙书之一。

1966年，笔者赴日成为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新闻学科的二年级插班生。为了学以致用，从第二年开始，我便不断为新加坡的两家中文大报投稿，反映日本的动向。《星洲日报》多刊于“通讯版”，《南洋商报》则刊于“综合版”。尽管我寄给《星洲》的稿件远远多过投递给《南洋》，但后者为了表示重视，还为我冠上“本报驻日本特约记者”的名堂。作为新闻系的学生，当时的内心是十分喜悦的。

有一年回国度假，我这个谁也不认识的“驻日本特约记者”带着稿费单想顺道到《南洋商报》领取稿酬时，却遇到了一个小难题。原来商报有一个规定：“所有稿费，都得在三个月内领取，逾期作废。”为此，我向会计部门解释我身在海外，也没注意到有此规定，但不得要领。这时恰好有一位文质彬彬的老先生经过，问明缘由之后，便带我到一个角落坐下聊天。他——便是鼎鼎大名的《南洋商报》主笔冯列山博士。

在获知我在日本东京攻读新闻学时，冯博士显得特别高兴和有亲近感。他详问我及内人蔡史君的研究方向，并问我手头上是否有早已绝版的1951年版的《南洋年鉴》，他有多一本想要送给我们并约我们第二天到他家做客，然后一起游车河。冯先生同时向我表示：“以后稿件你就寄给我好了，稿酬我代你领取和保管。因为目前报馆的制度不完善，外地作者的稿酬正好处在三不管的地带。”

第二天，我们如约到冯府拜会冯先生及其夫人葛青凡（笔名为芝青，是历史小说家，著有《武则天》、《中国行》、《日本行》等作品）。葛老师是颇受学生敬爱的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的讲师，战前曾到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明治大学，因此和我们有不少共同话题。

在冯宅聊了一阵之后，冯先生建议开车到新加坡北部的三巴旺海边散步，然后回程在三巴旺九英里处一家以“酿豆腐”闻名的客家餐

馆用餐。葛老师还补充说道：“冯先生特别喜欢开快车。”于是乎，我们四人便有说有笑，按照原定计划抵达海边和用餐，度过了充实的半天。冯先生和葛老师都十分健谈。冯先生和我们讲了不少鲜为外人所知的报坛掌故和新闻理念与实践的诸多矛盾及如何应对的难题。葛老师则向我们介绍了教育界的乱象及新马华文教育界的前途和隐忧。从两老的谈话中，不难看到他们对我们新一代的知识青年的关怀，并寄予极大的期待。

如此这般坦率对话与交流的“半日游”，后来几乎成了我们每次回星洲探访两老时的固定行程和公式。印象里，当时年纪已过60的冯先生已做好退休的准备。

1971年5月初，从报上获悉冯列山先生被委任为《南洋商报》代总编辑兼编辑委员会主席和主笔。

行将退休的冯先生为何突然受委以重任呢？

原来在1971年5月2日，政府援引内部安全法令（即不需公开审判和法定程序即可下逮捕令的紧急法令）逮捕了时任《南洋商报》总经理李茂成、总编辑仝道章、主笔李星可（1971年2月1日被《南洋商报》社长以重金从《星洲日报》挖角到商报）和公共关系经理郭隆义。这是新加坡政府对当地华英文报章涉嫌“黑色活动”（据官方最早发表的文告，指的是“由外国组织，通过内在工作人员，在当地制造破坏和麻烦的事件”）所采取的“黑色行动”（Black Operation）的一部分。《南洋商报》的罪名是：“大事渲染亲中共的新闻，并且在华文和华人文化问题上发动种族主义的情绪。这种作为，如果不及时加以制止，势将引起种族主义的爆发。”

针对官方的指责，《南洋商报》社长李有成全面否认。以下是新加坡文化部在1971年5月25日发表的文告，及李有成社长在同年5月26日发表的声明（两者皆刊于《南洋商报》1971年5月26日）。

文化部文告照录

【新加坡廿五日讯】文化部今日发表文告如下：

南洋商报社长李有成先生在五月廿四日的报纸所发表的声明中说：

“南洋商报的政策绝不是炫耀共产制度，我们否认这点。”

但是，该报的总编辑三苏丁全道章受该报社长李有成先生的训令，在一九七一年四月二日所签发的下列指示，却有不同的交代。

该指示全文如下（附上原文影印本）：

通知

奉 社长谕，自即日起所有有关中国新闻，不论长短，事无巨细，除造谣诽谤者外，全文照译，刊载第一面要闻版，如要闻版版位不够时，可移刊其他版位，敬希注意，为荷。

此致要闻组林品先生

总编辑：全道章启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日，副本：呈社长

本报社长声明

本人兹重申南洋商报的政策绝不是炫耀共产制度。事缘四月一日，当第卅一届国际乒乓团体锦标赛正告结束时，报上刊载中国邀英国、加拿大等乒乓队于世界杯赛过后访问北京。

当时一般读者正热心关注此项世界性乒乓外交动态，我们以新闻事业所应具备的处理应时要闻的方式，必须使有关编辑注意，所以特命总编辑发出书面指示，全道章先生遵命签发此项工作指示文件，乃公开负起其职分上之责任。足以表明其没有个人成见。此中毫无任何阴谋，可想而知。

我们认为在这期间多刊中国新闻乃应读者热心关注此世界性动态之需求，纯属一种临时处理新闻方法，并非炫耀共产制度。

李有成

从两者的“文告”和“声明”中，双方争执的焦点之一是对《南洋商报》处理中国新闻（包括中国的乒乓外交）的手法和态度有着截然不同的诠释。官方文告认为，《南洋商报》刻意渲染中国新闻，旨在“炫耀共产制度”；社长声明则强调“在这期间多刊中国新闻乃应读者

热心关注此世界性动态之需求，纯属一种临时处理新闻方法。”

在这非常时刻临危受命出任代总编辑兼编辑委员会主席及主笔的新闻学博士冯列山，又是如何应对这场新马战后以来最大的报业风波呢？

从当时《南洋商报》的版面来看，该报的基本立场是：

一、强调官方所说的“黑色活动”与《南洋商报》无关。

二、要求当局早日释放该报四名高级职员。

三、希望通过协商与对话的途径，化解当局对该报的“误解”，从而早日平息报业风波。

四、阐述该报的新闻观，特别是对有关报纸与政治关系的看法。

这些呼吁与基本态度，除了体现在该报社长的声明之外，也反映在该报如下的一系列的社论（《南洋商报》使用的正式名称是“社评”）之中。

1971年5月16日	《“黑色活动”与本报无关——本报被捕职员应即释放》
1971年5月17日	《新闻从业员的责任感》
1971年5月19日	《本月中当地报业的风波》（文末有如下“附告”：“本报四名高级职员被逮捕扣留，迄今已过了十七天，一点消息都没有。被逮捕者的家属忧心如捣，本报同人的工作情绪也深受影响。为此，我们盼望政府能立即将他们释放，以安众心，而释群疑。”）
1971年5月20日	《设法平息报业风波》（文末列有如上的“附告”）
1971年5月21日	《本报呼吁释放被捕的四职员》（文末列有如上的“附告”）
1971年5月22日	《我国新闻事业的重大考验》（文末列有如上的“附告”）
1971年5月23日	社评栏开天窗
1971年5月24日	《维护报业应有的权利》
1971年5月25日	《政府对本报缺乏深透的认识》
1971年5月26日	《从“黑色活动”说到报业危机》
1971年5月27日	《以真知灼见澄清一切》
1971年5月28日	《报纸与政治》

1971年5月29日	《我国报业前途蠡测》
1971年6月9日	《国际报业协会与新闻自由》

上述的社评，当然并不完全是出自冯博士个人的智慧和主张，其中既有李有成社长的指示，也有来自编辑委员会和主笔们共同讨论的结晶。但从不少畅论新闻的本质、政治与民意、新闻工作者的基本责任乃至言论自由与民主社会诸多关系等行文来看，其中倒有不少是新闻学科班出身者最关心的话题与逻辑。加之冯先生是这“危机管理体制”的一把手，他的新闻论与新闻观肯定也会反映在这特殊时期《南洋商报》的言论上。结合这时期《南洋商报》的言论，再细读冯先生早年的新闻观及其《新闻讲话》，也许可以多少考察到他的“新闻理论与实践”的一些基本思路。顺便一提的是，社论开天窗，在新马报业史上（至少是战后时期），这还是第一遭。

1972年5月1日，冯博士卸任退休，结束了为期一年，被认为是“挥之不去的阴影”的非常时代总编辑的日子。

1973年夏天，笔者应《星洲日报》总经理黄溢华先生和总编辑黄思先生的邀请加盟《星洲日报》。

抵新后不久，我和内人便造访冯老先生夫妇，按照固有的行程和路线，冯先生开快车载我们到三巴旺海边散步，照旧在客家餐馆用餐。冯先生和葛老师依然是那么的健谈，只是语气显得较为低沉和谨慎。他似乎有许多话要说，但未明说。临别时，老先生对我这个刚从国外回来、三十刚刚出头、满载“新闻梦”的新科评论员，似有所指地给我留下如是的忠告：“我们从事新闻事业的工作者，既不能和政治走得太近，也不能离开得太远。太近了 we 难以下笔，太远了又失去了解新闻发展的嗅觉和管道。”

换句话说，“新闻平衡论”是冯博士对新闻理论与实践的一大观察与心得；或者说，这是他最想对我说的“新闻讲话”。

记得那年到报馆报到，一走进位于罗敏申路（有战舰街，即报纸一条街之称）三楼的《星洲日报》编辑室，黄总编辑便带我到他座位

后的一张桌子，说道：“以后你就在这儿办公。”

打开抽屉，空空如也，只有老主笔李星可先生两三年前离开《星洲日报》、跳槽到《南洋商报》之前与各方笔战的一本剪报集。可以想象，当年锋芒毕露、舌战群雄的李主笔的不少评论，正是发自我此刻坐着的墙角。

第二天，黄总编辑和黄溢华总经理约我到办公室细谈工作的具体内容。黄总编辑开门见山，表示报馆邀我回国，就是要我逐步取代主笔郭史翼先生的工作。他说道：“《大公报》出身的郭先生是李星可转到《南洋商报》后到《星洲日报》当主笔的。但因为他申请的新加坡公民权一直未获当局批准，因此我们只能安排他撰写国际问题的社论。你刚从国外回来，也许不太熟悉此地的空气，你的主要工作就是分担郭先生的国际问题社论，并撰写每周的国际政治热点专栏‘新闻眼’（3000字，后改为撰写6000字的‘天下事’版）。 ”

他还补充道：“为了减轻政治风险，你虽负起全职的主笔工作，但对外称为‘社论委员’为宜，至于所有政治责任则由我来承担。”

除此之外，曾在我陪同下考察《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上任不久、干劲十足，准备有一番大作为的黄溢华总经理则给我加上一个名堂，委任我为“研究部主任”（后易名为负责策划、研究和培训的“执行编辑”），直接归他管理。

撰写社论、负责“策划、研究”与报馆内部的记者培训，这些工作其实与冯先生晚年在报馆的工作性质颇为近似。

为此，每当我们拜访冯先生夫妇时，我总爱从他那儿寻求相关的经验、智慧与灵感。实际上，我在报馆期间也曾为新记者和“星洲少年”的通讯员举办过短期的培训课程，但不成气候。

也许，当时我最想问冯博士的一个问题是：“一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要怎样才能做到既跟政治接近，又跟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境地？”但这一句话，我始终问不出口。

1983年，《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合并为《南洋·星洲联合早报》，我见了不少原本隶属《南洋商报》的编辑部人员（其中也有冯先生的前学员），从他（她）们那里听来了不少有关冯先生在商报时期的

故事和轶闻。一位和我们一起撰写社论的同事最喜欢提起的一件事是“冯先生撰写社论当天一定系好领带，神情严肃”。此事我虽未曾确认，但冯先生在撰写社评时十分认真和慎重，是不难想象的。从他撰写的诸多评论中，我就有这样的感受。

1987年，我奉命到东京创设《联合早报》驻外首个特派员的办事处，负责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报道与评论工作。1989年，我应聘为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副教授，转入学界。在这之后我返回星洲的次数较少，时间也较短，因此也未拜访冯先生和葛老师。

记得是在90年代的某一个夏天，我有事回国，在途径冯宅之前便拨电话给冯先生表示要去探访他。冯先生非常高兴，但他告诉我一个坏消息，葛老师已经因病走了。此刻，有一位来自斯里兰卡的女佣在照顾他。

一进冯先生迁移至郊区的屋子，就可以感受到文人独有的书香气息。他带我从前厅到后厅观览挂在墙上诸多旧交的亲手笔迹，其中包括丰子恺的短信等。他和我谈论了不少报纸和政治的话题，也关心我在日本学界的工作情况。他原本坚持要留我在他家共进午餐，但我因为有约，只好告辞。没想到这一告辞，就是永别。

冯先生是在1998年8月12日逝世的，享年91岁。

我是在他逝世一段时间后才获悉此噩耗。原来在他病逝之后，报上曾出现有关他安息后遗留下来的藏书如何安置的问题。根据报道，冯博士与葛老师的丰富藏书在新加坡无法觅得适当的去处，最终只得送出国门到邻国马来西亚新山的南方学院（现已升格为南方学院大学）落户。

几年前，我曾到南方学院访问，想翻阅冯列山夫妇的藏书，但当时据说尚未整理好，不便供外阅览。冯列山·葛青凡藏书的专柜，此刻想必已陈列于该校图书馆。

回顾与冯先生的上述交谊，无非是想让读者对一代报人在南洋办报的生涯有些微的认识。从我们东南亚的角度来看，冯列山先生，正如其他和他同年代的新马名报人，如连士升、李星可、全道章、郭史翼、黄思、杨守默和吴之光先生等一样，都是从中国南下的“南来文

化人”或“南来报人”。他们都曾直接或间接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也都曾经历过从中国人（华侨）转为华人，身份自我认同转变的过程。他们都堪称新马华文报业的先驱。

至于像笔者同年代的新闻工作者，基本上都是本地土生土长的，而其中不少都曾经在风风雨雨的南洋大学（1953—1980）受过教育。

可以这么说，从“南来报人”到“南大人”，是这几十年来新马华文报坛基本成员转换的一个缩影。

现在，不仅“南来报人”已离我们远去，就是“南大报人”也将逐步淡出报坛，走进历史。值此时刻，出版报业先驱者的文集，不乏其重大的意义。

收集在本文集的，主要是冯列山先生南下之前的文章和评论。如果编者能在这基础上，扩大范围，进一步搜集冯先生到新马后的新闻活动记录及其文集，并从中探讨和研究冯先生战前与战后、南下前与南下后（对我们来说是“南来前”与“南来后”）新闻观与新闻实践的变与不变，对关心新闻学的年轻读者（不论是中国读者还是东南亚读者）来说，相信都会有其借鉴之处。

东拉西扯，天南地北，写了一篇不像序文的序。

卓南生

草书于2014年初冬的京都